

陶罐，万年前的土与火之歌

台传媒记者王佳丽/文 杨辉/摄

它，没有具体的名字，泥质夹细砂红衣陶，是这一类陶器的统称。如它一般，在仙居下汤考古工作站库房的架子上，陈列着几百件造型相似的陶罐、陶盆、陶壶、陶杯等，它们都是古老而珍贵的无名氏，一群来自近万年前的造物。

不过，这只陶罐，因为别出格之体例，显得格外醒目。

今年6月4日，考古工作人员在一个坑内发现了它，“这只陶罐不仅体积大，我们清理后，还发现陶罐内部有多件陶器。”参与挖掘和修复工作的侯雨回忆。

当第一缕暖风吹散长达1300年的寒冷，飞翔的海鸟掠过比如今海平面更低的东海海面，人们抬头仰望天空，在他们的期盼中，一个气候稳定的新世界即将到来。

从入海口逆流而上，在浙江中部的逶迤群山间，流淌着一条条江河，散落着一块块平地，有一群“上山人”，在这些平坦而丰饶的土地上选择定居生活。他们将家园营建在广阔的旷野之上，形成了早期的村落。位于灵江流域的仙居下汤，也是被他们选中的理想家园之一。

当第一批“上山人”翻山越岭来到这里，他们可能会雀跃，为找到这一片梦寐以求的栖息之所——莽莽括苍山与大雷山相夹，形成了东西狭长的流域盆地，灵江上游永安溪穿山而过，静静流淌，下汤遗址便坐落在灵江上游最大盆地的中央。这里四面环山，北高南低，从北部山间蜿蜒流出的四鸟坑穿过盆地，往南汇入永安溪。山林、平地、水源皆备，这里是一处完美的居所。

于是，他们停下脚步，在盆地中央一处微微隆起的台地落了脚——一块俗名“汤墩”的高台。

如今，整个下汤遗址便是以高台为中心，呈不规则圆形，南北长约180米，东西长约150米，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不过，在之前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已经有了许多发现——在遗址的西南方向，发现了建筑遗迹、农业加工遗迹、红烧土面与陶器坑，东南面和北面则分布着不少人工土台，人工土台上还有大大小小



的陶器坑。高台下，另一批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古壕沟，在已经裸露的地方，我们能清晰地看见人工开凿的痕迹。9000多年前，下汤人曾在此开挖壕沟，用以保护自己的家园。

“下汤遗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史前遗址。通过这几年对下汤遗址的考古工作，我们对上山文化时期的村落形态、生产生活有了初步了解。同时，它也为我们了解万年前的早期村落提供了一个样板。”仙居下汤考古工作站负责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仲召兵说道。站在遗址中间的高台上，透过一件件文物和古老的痕迹，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万年前的古村落——人们挖槽栽柱、建造房屋、开沟凿渠、生产加工。当第一颗稻谷在这里被播下，第一座房屋在这里被建起，第一缕炊烟在这里升起……一颗文明的种子，在永安溪畔生根，此后绵延万年，生生不息。而这片遗迹犹如沧海中的方舟，逃过时间的毁灭，载着一船远古人类的生活遗踪，告诉我们“何以台州”“万年华夏”的奥秘。

很难想象，这只“巨大”的陶罐，来自9000多年前。

陶罐素面、敞口、鼓腹、平底，窄沿外折。说是罐，其实更像是一只“缸”。罐口直径46cm，高46cm，腹部直径40cm，底径20cm，壁厚约1.6cm，被发现时，罐内还放置有20余件小陶器。

“陶罐内装陶器，这种情况在上山文化里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陶罐也是目前上山文化发现的最大的一件器物。器型之大，我们初步判断，它用泥片贴筑法成型。关于它的功能，我们大概有两种推测，一种认为它是窖藏的性质，还有一种认为可能和丧葬有关系。”仲召兵介绍。

下汤遗址出土的陶器数量多，大部分为泥质夹细砂红衣陶。这类陶器最突出的特色，便是陶身饰有红色颜料，有的则是通体红色，有的以条带状装饰于唇口或肩颈位置，看起来简约而大气。

从这些出土的陶器来看，下汤先民不仅掌握着成熟的制陶技术，还具有一定的审美流行和特定的风俗习惯。那么，下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东方既白，红日跃出，属于下汤人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首先，食物的获取对远古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稻米，是这一段下汤故事里的主角。

下汤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炭化稻米，研究人员通过对水稻小穗轴面光滑与否的对比、稻谷植体形态、粒形长宽比的研究，发现它们都不属于野生稻，这说明下汤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栽培水稻。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多处原地使用状态下的磨盘、磨石，它们曾被用于稻

米等食物的加工。彼时，种植水稻、收集稻米，已经是下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不过，上山文化时期虽已普遍食用水稻，传统的渔猎采集经济应该仍占有较大的比例。

在这里，有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河流，是先民们天然的猎场。下汤人选择就地取材，在高台附近的河滩收集砾石，将石头打制成趁手的武器——石器。他们带上石球、石锤、石斧等，勇敢地向山林、沼泽、河流进发，采集橡子、打猎菱角、捕捉猎物。他们找准时机，用绳系住的石球当作飞索石砸向猎物，一次、两次，直到迎来最后的胜利。

当然，下汤人也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

他们开挖壕沟，将立板围成房屋，建设人工土台，用红烧土铺设仪式广场……考古人员目前发现了8座人工土台，最大的一座南北长约22米，用纯净的黄土堆筑，土台上还埋有10多座器物坑。红烧土广场的东西长度至少有25米，在红烧土面上，考古人员也发现了20余组陶器，这些陶器皆被一层厚约15厘米的黄褐色土所掩埋。

也许，在无数个对下汤人来说充满意义的日子里，他们会相聚在土台、广场，向着上天祈福，献上最为满意的陶器，以展示自己虔诚的奉献；抑或是载歌载舞，享受美食，庆祝平安与胜利。

不过，兴衰有时，延续了千年的上山文化的终结，发生在8500年前左右。文明的更迭，犹如红烧土广场上的那层黄土，只在地层里留下浅浅一页，像是为一个时代的谢幕披上一层薄薄的黄纱，等待后人掀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下汤村村民在村东北的“汤墩”上取土，发现了大量石器和陶器碎片，由此叩响了这段埋藏万年的时光。1984年，地方文物部门将其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之后，仙居县文化局将下汤遗址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与下汤村签订保护协议书，成立文保小组。1989年，该遗址被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走向汤墩的路上，依然能看见当年筑造的用于保护的土围墙和“下汤遗址”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下汤遗址的种种疑惑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甚至在最初的判定中，这里被认为是“年代距今约7000—5000



年。”随着考古的深入，下汤遗址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惊喜。

201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试掘，初步了解到遗址的年代、各阶段的文化面貌等信息。2018年，下汤遗址入选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名单。同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

在下汤遗址展厅内，有一张图格外引人注目，也是考古人员当年的重要发现——在同一地层的剖面上连续叠压不同文化序列，从最下层的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500年）开始，跨湖桥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好川文化（距今约4300—3700年），以及最上层的商周时期遗存（大部分已被取土破坏），时间跨度之大，文化序列之清楚，在浙江先秦遗址中具有唯一性，是浙江乃至我国东南地区年代跨度最长且保存较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随后，考古工作没有停下脚步。2021年，考古人员对外围进行了勘探，初步了解遗址外围地貌及环境、道路系统。2022年，成立下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上山文化”保护和申遗工作专班。2023年，《下汤遗址保护规划》公布实施，下汤遗址稻作文化项目（专项债）通过审批，《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预备文本》完成编制……

时间流转，今年是下汤遗址发现40周年。为此，仙居县通过推出专栏宣传、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向大众讲述万年仙居文化故事。同时，加紧推进下汤遗址考古公园规划建设步伐，并加入上山考古遗址联盟，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相信不久的将来，有关万年下汤蕴藏的丰富的文化宝藏，将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

九月稻黄，走在遗址的乡间小路上，风吹稻浪，发出飒飒轻声。每一声，似乎都是历史的应答，来自万年的回响。

小人尖青铜器：揭开西周祭祀的神秘面纱

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 杨辉/摄

在路桥，石浜山犹如一片静谧的绿洲，悠然铺展着岁月的画卷。这里不仅是市民休憩的乐园，更是古今文化的交汇点，尤以小人尖为代表。

小人尖，这个地名听起来充满童趣，承载的却是西周时期庄重而神圣的祭祀盛况。

1990年，一次不经意的建筑施工，让小人尖的西周遗珍重现人间。多件青铜器等文物出土，揭开了远古历史的一角。彼时，路桥还是一个镇，属黄岩管辖。小人尖的出土文物也因此收藏在黄岩区博物馆中。

为何远离中原腹地的台州沿海有祭祀遗迹，小人尖缘何成为古人祭祀之选？这些历史谜团，令人着迷。

1990年5月，路桥石浜村的村民们正准备自筹资金，计划在小人尖山顶为老年公寓福泉乐园修建一座凉亭。

5月5日，几位挖土的老人在土层深处意外发现青铜器与原始瓷器，这些斑驳的遗物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无名小山丘挖到大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政府迅速反应，将这一惊人发现上报给黄岩博物馆，并第一时间组织公安干警对现场实施24小时保护，确保文物安全。

时任黄岩博物馆馆长符艺楠听到消息时，心中有着难以言喻的激动。他深知这批文物尤其是青铜器的挖掘，对于研究当地乃至整个浙东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符艺楠迅速致电浙江省考古所，详细阐述了小人尖出土文物的

情况，并请省所派遣一支专业团队来现场支援，进行科学的清理、保护和研究工作。

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回应。5月9日，浙江省考古所的杨楠风尘仆仆地抵达台州，与等候多时的台州地区文管会金祖明、符艺楠会合。他们迅速乘车前往小人尖，迫不及待地想要亲眼看看这份来自远古的“馈赠”。

根据符艺楠保留的工作记录，山顶上有一座两米多高、底径十多米长的大土墩，施工队就从土墩的中部开始挖掘，挖到大约1米多深的地方，就挖出了器物。

随着考古队抢救性挖掘的进行，土层被一层层剥离，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逐渐显露真容。“出土的有青铜器、原始瓷器，还有少量玉器，这些文物在浙南地带同时被挖掘出土，还是第一次！”符艺楠激动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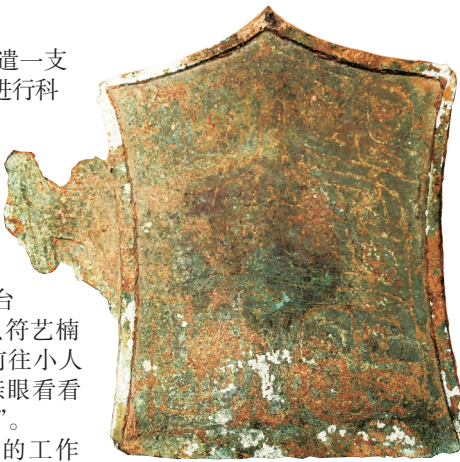
5月17日，户外考古挖掘正式结束，考古队共清理出78件文物。其间，考古专家牟永抗、吴汝祥也抵达现场。他们仔细研究每一件器物的形制与特点，最终断定小人尖遗址的年代不会晚于西周晚期。

当时，专家推测小人尖遗址可能是一处土墩墓，因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是浙江地区土墩墓中不可缺少的随葬品。但是，考古现场并未发现墓坑、人骨及葬具遗迹。

经过反复论证与探讨，有了另一种推断：小人尖遗址更有可能是一处祭祀遗址。现场出土的原始瓷器和青铜器，尤其是排列有序的瓷豆，作为古代祭祀的重要礼器，仿佛在默默诉说一段被遗忘的仪式与庆典，也为小人尖遗址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庄严。

在黄岩区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4件来自小人尖遗址的青铜器珍宝——青铜斧、青铜钺、青铜短剑与青铜料。

当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些青铜器，不禁



会好奇：它们从何而来？

青铜斧长11厘米，呈扁平长梯形，两面各有一组兽面纹，斧刃微弧，略宽于器身，釜也就是斧子上端的孔，是长方形的，便于安装木柄。

青铜钺呈长方形，一端较平，另一端两边向内斜收成尖状，内部凹陷，反面微鼓，阴线刻画三组兽面纹。钺是古代的一种兵器，通常也作为仪仗器物。

青铜短剑长24厘米，无格无首，剑把前部扁平附两耳，后部呈圆柱形，中间凸起叫剑脊，刻画勾连云纹样。脊两侧装饰云雷纹。这把青铜短剑与同时期在安徽省屯溪西周墓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雉城镇（商周时期）出土的铜剑进行对比，能发现类似的造型和工艺特征。

料是古代的一种挹酒器具，多流行于西周时期。这把青铜料长15厘米，口径平直，腹部微微鼓起，平底，杯口和底部有凹进去的弦纹，弯曲的长柄上有云雷纹饰。

透过这些青铜器，我们仿佛穿越千年时光隧道，一窥那遥远青铜时代的壮丽景象。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青铜时代作为一部辉煌璀璨的篇章，横跨夏、商、周。中国青铜时代以礼器

为大宗，体现了中国人“藏礼于器”的深厚观念。青铜兵器，不仅作为实战兵器使用，还逐渐融入贵族的礼仪体系，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小人尖遗址出土的22件青铜器中，除上述器具外，还涵盖了尊、戈、矛、镞、锥等多种类型，均非日常所用，而是与祭祀、宴飨紧密

相连的尊贵礼器。鉴于古时浙东南铜铁矿资源匮乏，当地难以自行生产如此精美的青铜器，这批青铜器应该是从中原或北方地区长途跋涉而来。这样的推测，更为合理。

另外，一同出土的原始瓷器，带有鲜明的瓯越文化风格。因此，小人尖遗址无疑是中原文明与瓯越文明交流互动的有力见证。

由于历史的记载有限，对于小人尖祭祀遗址，我们不得不依靠零星的考古发现与合理的历史推断，来构建更为深远的猜测。或许，这里曾是古代某一重要部族的圣地，他们在此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祈求神灵庇护，同时也是权力与地位展示的场所。更有可能的是，小人尖遗址见证了多种外来文化的交汇与碰撞。

数千载岁月流转，黄岩、路桥古为瓯越之腹地，伴随人潮的迁徙与交融，这片土地不仅与越文化的核心区域日益紧密，更有遥远的北方文化之风吹拂至此，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升。

文明交融的具体历史细节尚待进一步揭示，学术界已提出多种关于文化交融的猜测与假说，如瓯人与徐国余部的融合、瓯人与越人之间的融合等等。无论哪种论调，都如同历史迷雾中的微光，引领我们探寻文明交融的奥秘。

小人尖遗址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无疑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后世留下无尽的遐想与探索。

（参考文献：《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博物馆，《1990年黄岩小人尖土墩墓的考古经历》杨楠）



下汤泥质夹细砂红衣陶



小人尖青铜器

扫一扫 看望潮APP